

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银发经济繁荣

——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杨菊华 刘轶锋

摘要: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命题之一。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已成为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随着中国人口发展步入新阶段,人口高质量发展为银发经济繁荣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人口高质量发展与银发经济之间的关系,既源于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的人口理论,又是生产性老龄化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等理论的具体实践。在内在逻辑上,老年人口的总量充裕可推动消费需求的规模化,素质优良可推动消费习惯的品质化,结构优化可促进消费产品的精细化,分布合理可诱发银发市场的层次化。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与银发经济齐头并进,可从践行积极老龄观、强化创新驱动、做好分层分类、提升人口素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着手,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

关键词:人口高质量发展;银发经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1.009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入以及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银发经济已经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之举^①。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对银发经济作出明确定义,即“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同时也提出了发展银发经济的若干建议。同年9月,国务院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为主题进行专题学习,将银发经济扩容提质作为未来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②,体现了党中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在国家力量推动下,银发经济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③。

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始终是国家繁荣与社会和谐的核心动力之一。当前,中国社会面临两个重要转型。一是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近年来,少子化、高龄化和区域增减分化成为了中国人口发展的新特征,这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巨大压力和挑战,亟须人口发展思路 and 方式的创新^④。立足人口新变化与新特征,全面认识、主动适应人口发展新趋势,优化人口发展战略,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指出,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时空特征、机遇挑战与路径机制研究”(23ZDA019);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退休潮’背景下新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及释放路径研究”(24CRK004)。

作者简介: 杨菊华,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Juhua_Yang@muc.edu.cn);刘轶锋,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南京 210037; lyf_geron@163.com)。

① 蔡昉:《以发展银发经济拓展经济循环链条》,《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

②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九次专题学习》,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8/content_6970683.htm, 访问日期:2024年8月29日。

③ 穆光宗:《银发经济的发展机遇与方向》,《人民论坛》2024年第1期。

④ 陈卫民、张奇:《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实践意义》,《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⑤ 杨菊华:《人口高质量发展:科学内涵、动力势能与进路策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

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①。二是经济发展动力从过去粗放式和以劳动力消耗为主的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型^②。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意味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智能化、绿色化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变革,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质量^③。此外,新质生产力不仅注重数量的增长,更关注生产力如何惠及个体福祉的提升。发展壮大银发经济不仅是这种“以人为本”的生产力在老龄领域的重要体现,也是适应人口发展新趋势,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亦是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到生产性老龄化理论,反映出人类社会对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总是伴随着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而深化。总体上,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人口总量与经济增长。现有研究认为,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带来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使低收入国家进入“人口陷阱”^④。但是,人口规模会带来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加之技术创新推动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故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也会有正向的推动作用^⑤。第二,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虽然从数量角度看,人口老龄化将带来劳动力规模的减少和消费水平的降低,影响经济增速,但依据第二次人口红利和生产性老龄化等理论,老年人是有能力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潜力人群,人口老龄化不应被视为洪水猛兽^⑥。第三,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人口素质提升有助于人力资本发挥“储能效应”,故而在人口素质提高的背景下,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优势^⑦。第四,人口分布与经济增长。人口分布与区域的经济增长之间则是正向与负向关系并存,只有顺应人口迁移流动的客观趋势,人口与经济社会才能实现区域均衡发展^⑧。

现有研究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之处,但这些研究更多是以传统的人口与经济形势为基础。伴随中国人口进入新阶段,如何调整社会经济体制,适应人口发展的新形势,挖掘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是值得重点关注的时代命题。那么,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银发经济繁荣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何?如何通过人口高质量发展构建银发经济新格局?实现银发经济繁荣,不仅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人口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在此背景下,人口高质量发展与银发经济之间的关系值得系统梳理。

二、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话题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到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正是人们对该议题的认识过程^⑨。人是消费者,亦是生产者。一方面,人口是经济发展的支撑与基础;另一方面,经济繁荣的核心要义便体现在人自身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需要转化为群众获得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7页。

② 任保平:《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

③ 洪银兴:《新质生产力及其培育和发展》,《经济学动态》2024年第1期。

④ 李竞博、姜全保:《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人口学刊》2023年第2期。

⑤ 穆怀忠:《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与经济增长》,《中国软科学》2024年第5期。

⑥ 汪伟:《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1期;胡鞍钢、刘生龙、马振国:《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人口研究》2012年第3期。

⑦ 王金营、杨一丹:《技术扩散中人口规模和质量的作用:来自OECD的实证》,《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耿志祥、孙祁祥:《延迟退休年龄、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统计研究》2024年第5期。

⑧ 吴瑞君:《从“五普”到“七普”: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增长的时空耦合和区域均衡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⑨ 石智雷、彭锐城、王璋:《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增强。银发经济的发展也将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改善奠定基础、提供保障和创造动力。

（一）人口陷阱：人口规模扩大引发经济增长的负反馈

十八世纪末，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阐释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以算术级增长的物质资料和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再生产构成了一对矛盾关系，人口过剩导致经济贫困将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具言之，随人口规模的扩大，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将被稀释，当人口超过环境与资源的承受范围时，饥荒、疾病和战争等自然调节机制就会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①。由此而言，人口增长与经济低迷之间存在恶性循环，经济会不断回到并困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这即是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陷阱”^②。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意味着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负反馈机制，他认为尽管技术进步可能暂时提高资源生产能力，但最终人口增长仍会超过资源增长，导致再次出现贫困。因此，马尔萨斯提倡采取推迟婚姻和减少生育率等预防性措施来控制人口增长，从而跳出人口陷阱。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具有深厚的时代背景，其所描述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主要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的写照^③。随着技术的持续更新和变革，马尔萨斯对人口和经济关系偏悲观和机械的预测使其备受批评，其提出的“人口陷阱”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④。批评者认为马尔萨斯仅仅考察人口与生活资料两者的关系，否定了生产方式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也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展开尖锐批评。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并未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角度考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问题^⑤，贫困或经济的落后是相对人口过剩的后果，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剥削和不平等分配。首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市场的供需关系总是随经济周期而波动。具体而言，资本家会在经济繁荣时大量雇佣劳动力，而在经济衰退时迅速裁员，形成相对过剩人口。这种不稳定的劳动力供需状态，造成了劳动者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压力，反过来又会抑制消费能力，影响资本的持续增长^⑥。其次，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劳动者的工资待遇由此受到打压。即当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时，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工人们往往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工资以维持基本生活开支，而劳动力竞争加剧又会导致劳动者的生存条件不断恶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因此，“相对过剩人口”常常被资本家用来压低工人工资，增强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增加工人的被剥削程度^⑦。再次，虽然技术创新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中被视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但大量被机械化和自动化技术挤出的过剩人口往往不具备新经济业态需要的劳动技能，失业与贫困等社会问题由此出现^⑧。最后，经济层面的不稳定引发社会不满和抗议，形成阶级斗争的人群基础与社会心态。马克思预料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相对过剩人口对社会不满加剧，最终可能导致无产阶级的觉醒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⑨。

（二）人口红利：人口结构转变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人口红利理论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而兴起^⑩。人口红利主要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阶段，劳动年龄人口（通常指15至64岁的人口）相对较多、抚养比率较低的人口结构会为经济增长提供

① 蔡昉：《马尔萨斯何以成为最“长寿”的经济学家？》，《读书》2013年第11期。

②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杨菊华、杜声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页。

③ 陈功、张吴璠：《争鸣中前行：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人口与发展》2016年第4期。

④ 孔令锋：《人口与经济：从历史到现实的认识》，《人口与经济》2001年第3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1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46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01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37页。

⑩ 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机会和优势^①。与马克思和马尔萨斯更加关注人口与经济之间矛盾关系的视角不同,人口红利更偏重于诠释人口结构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此理论主张中国正是把握住了人口红利的窗口期,才创造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伴随生育率与死亡率双降,人口转变步入新的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人口红利理论逐渐受到挑战^②。在此背景下,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形成,为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增长开拓了新的视角。第二次人口红利认为,提升人口素质可以抵消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若能充分利用各年龄段人口的人力资源,重构社会生产方式,最终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③。如果说传统人口红利理论主张的驱动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偏向年轻化的人口年龄结构,那么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的驱动因素是教育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创新能力提升。就此而言,人口老龄化并非只会带来经济负担的增加,也可以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和延长工作年限、教育和培训、养老体系改革和促进技术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机遇。即在老龄化社会,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参与度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通过消费和生产活动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提供了新的机遇。

(三)生产性老龄化:人口素质提升造就经济增长的长寿红利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老年人具备更长的健康期,其在职业生涯中积累的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依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尽管新型技术有可能导致其技能失效,但通过培训与再教育,老年人亦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④。在此背景下,主张老龄化不是社会负担,而是一种潜在生产力资源^⑤的生产性老龄化理论(productive aging theory)形成。

生产性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的理念不谋而合,突破了过去消极的老龄观,强调老年人在工作、志愿服务、家庭照顾和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老年人积极参与劳动市场的意愿不断提高,他们在职场上的经验和智慧能够为社会带来独特的价值。现实中,许多老年人也会选择全职、兼职或者自主创业等方式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⑥。另一方面,老年人通过参与志愿活动、社区服务和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也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包容性^⑦。生产性老龄化理论为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即肯定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有助于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把握巨大消费潜力和市场机遇,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和转型。

(四)二元经济结构:人口合理分布与经济均衡发展

十九世纪,欧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城乡人口分布的剧烈变化。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和技术革新,推动劳动力逐步从农业转向工业,引发人们对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增长的关注。从亚历山大·洪堡的近代人文地理,到托达罗迁移模型以及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都诠释了人口分布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消费市场、创新能力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集中效应影响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在诸多人口分布理论中,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最大的为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dual sector model)。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该理论主要关注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尤其是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劳动力转移。刘易斯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一是低生产率的传统农业部门,二是高生产率的现代工业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工业化逐步推动经济增长,但当劳动力供

①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

② 原新、刘厚莲:《中国人口红利真的结束了吗?》,《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6期。

③ 彭希哲、周祥:《中国人口发展与老龄化应对》,《新金融》2024年第4期。

④ 朱荟:《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国家战略定位下的中国方案》,《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⑤ 南希·莫罗-豪厄尔:《生产性老龄化:理论与应用视角》,《人口与发展》2011年第6期;林进龙、穆光宗:《生产性老龄化:反思、超越与中国化》,《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3期。

⑥ 杨菊华、史冬梅:《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生产性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⑦ 宋璐:《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研究》,《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4期。

应趋近饱和时,工业部门的扩展将受到限制,工资差异缩小,经济发展面临瓶颈,即出现“刘易斯拐点”。这种经济结构二元性导致了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配置、资源分配、生产力提升等方面的深刻矛盾和不平衡^①。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主要被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但其理论框架也可以用来分析人口分布对银发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这一理论,人口集聚可以促进银发经济需求扩大,即随着老年人向城市集聚,城市银发群体的比例逐渐上升,资源、基础设施和医疗服务等与老年人群体相关的多样化需求增加。同时,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和地区性中心城市,其养老设施、健康服务、金融保险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基础相对较好,将成为银发经济的重要源泉。不过,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的城乡差异,也会转化为银发经济的区域发展差异。

无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马克思的相对人口过剩理论,还是传统人口红利理论,聚焦的都主要是人口数量和结构;而第二次人口红利以及生产性老龄化理论,则突破了对人口数量的聚焦,更加关注人口的质量要素。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下理论界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认识,构成了人口高质量发展与银发经济繁荣关系的理论基础(见表1)。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体现为总量充裕、素质优良、结构优化与分布合理四个维度,强调以整体和积极的视角审视人口数量、结构和质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体现了众多人口理论的集成与深化。总之,对人口高质量发展与银发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不仅源于马尔萨斯与马克思对人口规模的争论,还具体反映了第二次人口红利与生产性老龄化对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的重视。

表1 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理论	人口陷阱	相对过剩人口	人口红利		生产性老龄化	二元经济结构
			传统人口红利	第二次人口红利		
理论背景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发展社会	老龄社会		流动社会
理论契机	农业社会资源限制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	城镇化	经济新常态	老龄化加深	城镇化
理论关注	数量	数量	数量+结构	质量+结构	质量	分布
理论偏向	消极	消极	积极+消极	积极	积极	积极

三、人口高质量发展与银发经济繁荣的内在逻辑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规模持续增大,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快速提升,中国进入了真正的长寿时代。人口转变带来日常生活中的适老需求以及医疗、养老、康复、休闲娱乐等领域服务需求的增加。作为一个动态概念,银发经济的内涵和重点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在中国不同时期发布的政策文件中,养老事业、老龄事业、养老产业、老龄产业、银发经济等概念被广泛使用,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差异化侧重点。与养老事业、老龄事业、养老产业、老龄产业等概念相比,银发经济的内涵最广、外延更大,是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集中体现。以总量充裕、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分布合理为目标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当前中国人口发展新特征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效应不足的破局之策^②,也是促进银发经济繁荣的重要契机。

①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 pp. 139-191.
② 刘尚君、陈功:《坚持健康优先,支撑人口高质量发展》,《人口与经济》2024年第5期。

立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与构建银发经济新格局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从总量、结构、素质和分布四个维度诠释人口高质量发展与银发经济新格局之间的内在逻辑,并呈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与构建银发经济新格局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障碍,为支撑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的对策建议提供理论与事实基础。

(一)总量充裕推动消费需求规模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①。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5%。伴随着第二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陆续步入老年期,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持续攀升。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中方案预测,虽然中国老龄化发展速度不及全球平均水平,但到2050年,65岁以上人口也将接近4亿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老年人口的总量不仅直接影响其对健康、养老服务等产品的需求,还通过增强消费能力、拉动相关就业和激发新兴行业的发展,成为推动银发经济的重要力量。一方面,老年人口总量扩大直接作用于消费需求增加。随着老年人口增多,医疗健康消费需求显著上升,精神文化等领域需求也在增加。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总量扩大间接促进银发市场供给。老年人群的消费需求带动了医疗器械、健康管理和文旅康养产业的发展,推动市场提供适合老年人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的产品和服务。

庞大的老年人口总量使银发经济机遇与挑战并存。老年人口规模的过快增长增大养老服务的供给压力。虽然银发市场特别是养老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但由于基础公共设施覆盖面不足,相关服务供给人才短缺,企业无法充分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市场发展滞后。

(二)素质优良增进消费习惯品质化

从传统数量论的人口红利到以质量论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和生产性老龄化,实现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人口素质的提升。老年人口素质的变化必然带来老年人口异质性的增强,其对服务和产品的要求更加个性化、多样化和品质化^②。

一是财富素质。老年群体的消费能力增强成为银发经济发展的经济保障。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退休时有财富积累的老年人有着更高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愿意在健康、娱乐、生活便利等领域投入更多资金。但是,老年群体内部消费能力和支付意愿的差异也会抑制供给侧的发展。一部分老年人退休后享有较高的养老金和储蓄,能够消费高端医疗、养老院、健康管理等服务。然而,低收入老年人因较低的养老金收入和习惯于节俭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储蓄更多被用来应对自身的养老风险,而非被用于健康、护理等领域的消费。老年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使得老年消费的潜力未能释放,银发市场可持续的盈利模式难以实现^③。

二是健康素质。健康是生产与消费的前提,只有健康的衰老才能实现生产力的提高,成为社会消费和生产的基础。在供给侧,健康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源累积和人力资本效率提升等来扩大供给侧的人口红利。在需求侧,健康的提升既直接增强医疗服务领域的消费动机,也会带动老年人在其他领域的消费。健康状况的差异还会直接影响其消费能力、意愿和内容。健康良好的老年人,能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追求品质生活;而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则面临各种健康问题,需要长期的医疗和护理服务。这种需求的两极化增加了市场的复杂性,导致企业难以精准供给品质化的健康产品和服务。因此,发展银发经济不仅需关注健康管理和护理市场的“从有到无”,更要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和品质化的健康服务,以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需求。

三是知识素质。目前,尽管中国65岁以上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比重仅约为3%,但近20年来,老年

① 杜鹏:《积极老龄观视野下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人口科学》2022年第6期。

② 原新:《银发消费趋向享乐型、智能化》,《人民论坛》2021年第4期。

③ 贾晗睿、詹鹏:《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差距及形成原因》,《消费经济》2024年第1期。

人受教育水平在持续改善(见图1)。可以预计的是,随着队列更替,未来中国老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将持续提高,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可达10年,基本具备高中教育水平,受过高等教育比例快速上升^①。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提高了老年人的消费能力,需求逐渐多元化,也使老年人在消费时,更加注重产品和服务的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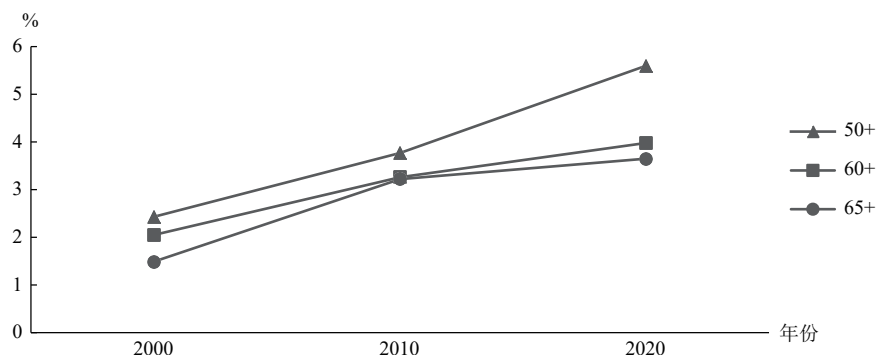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2000—2020年50岁及以上人口高等教育比例
(资料来源: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四是数字素质。人口老龄化和数字化是当前社会最典型的两个人口特征。老年人网络购物比例不断攀升,智能养老技术(如远程医疗、智能护理设备、健康监测系统等)在银发经济中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此外,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使老年人接触到丰富多样的消费理念和产品信息,老年人也逐渐接受了适度享受型消费的观念。也应该看到,尽管老年网民数量日渐庞大,但仍有约30%的老年人被排斥在数字技术之外^②,这些老年人存在较强的数字陌生感,难以适应和使用这些新技术。“数字鸿沟”成为数字经济与银发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阻碍。

五是消费观念素质。随着财富、健康、文化和数字素质的提高,老年人的消费观念逐渐从传统的节俭型向多元化与品质化转变。一方面,单纯节俭的消费观念开始发生变革。许多老年人摆脱了传统“家庭责任伦理”的束缚,不再将全部重心置于子女传承,开始关注个人需求满足和生活质量的品质化。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也促使老年人消费观念更加开放,他们开始将旅游、文化娱乐等消费活动视为丰富精神世界、缓解孤独感和融入社会的重要方式。消费不再仅仅是物质的交换,更是精神满足和社会交往的桥梁^③。

(三)结构优化促进消费市场精细化

老年人口结构主要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家庭结构等方面,其对银发经济的发展有显著且多方面的影响。理解这些结构特征能够帮助政府和市场更好地把握银发经济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方向,推动银发市场的精细化,实现银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④。

一是年龄结构。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在消费需求上存在显著差异。低龄老年人可能更关注旅游、健身、文化娱乐等活动,而中高龄老年人则更注重健康管理、医疗护理和日常照护服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在老年人口中的占比为18.8%。且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这一比例有持续上升的趋势。面对不断增加的高龄化趋势,长期护理、专业护理人员的需求激

① 杜鹏、李龙:《中国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发展趋势前瞻》,《人口与发展》2022年第1期。

②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s://www.cnnic.net.cn/n4/2024/0829/c88-11065.html>, 访问日期:2024年8月29日。

③ 盛亦男、尚佳佳:《社交活动对新一代老年人消费的影响》,《人口研究》2024年第4期。

④ 林宝:《发展银发经济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人民论坛》2024年第13期。

增,而护理行业的资源短缺和成本高企使得其难以满足高龄化的需求。因此,发展银发经济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的特点,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注重高龄群体的健康与护理需求。

二是性别结构。源于男性和女性预期寿命的差异,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与供给模式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例如,女性老年人可能更加关注健康护理、社交活动和精神文化生活,而男性老年人可能更倾向于参与体育活动和技术产品的消费。发展银发经济需根据性别差异设计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和产品,特别是针对独居女性老年人的心理关怀、社区支持和日常生活照料等服务。

三是家庭结构。随着社会的变迁,在生育率降低和代际分居逐渐普遍化的情况下,空巢和独居老年人的比例不断上升,他们更容易出现孤独、抑郁等精神健康问题,精神关怀和心理服务需求增加。然而,现有针对空巢和独居老年人的服务供给体系尚未成熟,面对人口转变引发的家庭结构变化,养老服务和养老产业还面临资源总量短缺和不平衡的问题。能够提升老年人独立生活能力的智能家居和适老化改造等消费,将成为未来银发经济发展的重点。

(四)分布合理诱发银发市场的层次化

源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基础公共服务和数字化程度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将引发城乡老年人在消费需求和产业供给结构的层次化。银发经济作为围绕老年群体展开的产业体系,必须根据城乡老年人口的不同特点,提供层次化的产品和服务。

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之异。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攀升,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现象加剧。城乡老年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得养老公共服务的资源分配成为银发经济均衡发展的关键点^①。在城市地区,老年人享有更多的医疗资源、养老服务和社会保障,还可以通过社区养老、养老院、家庭护理等多元化的方式获得养老服务。而农村老年人受制于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条件,面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同时,农村地区往往缺乏专业化的养老机构和护理人员,养老服务更需要依赖家庭和本地社区。二是数字技术覆盖之异。城市老年人源于更高的资本禀赋,对新技术的接受度也较强,这使得智能养老、远程医疗等技术在城市推广较为顺利。农村老年人则面临更为严重的数字鸿沟,限制了数字技术在农村养老中的作用。

老龄化的城乡空间格局影响着银发经济的具体形态和发展模式。一是消费需求结构。城市老年人通常具有更好的收入保障和社会福利,消费能力较强,对医疗保健、养老院、社区护理、智能健康设备和精神文化等服务和产品的需求较大,且对服务质量和生活品质有较高要求。银发经济在城市中能够涵盖多个领域,例如老年健康管理、休闲旅游、养老社区、文化活动、智能化生活设备等。反观农村老年人,其消费能力相对较弱,消费结构较为单一,更多集中于基本生活、医疗照护等方面^②。因此,在农村地区,发展银发经济的重点需放在提供低成本的医疗服务、居家养老以及公共服务的普及方面。二是产业供给结构。在城市老年人高消费能力的推动下,城市地区的银发产业较为多元化,包括养老地产、健康医疗、老年教育、金融服务等。农村地区由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为落后,银发产业供给多为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供给内容侧重于建立养老院、社区照护中心、村级医疗服务点等等社会公益和基础服务。

综上,人口高质量发展与银发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① 胡湛:《发挥小城镇发展对农村养老建设的基础作用》,《人民论坛》2024年第13期。

② 谢永飞:《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人口:问题、挑战及应对——与城市、镇的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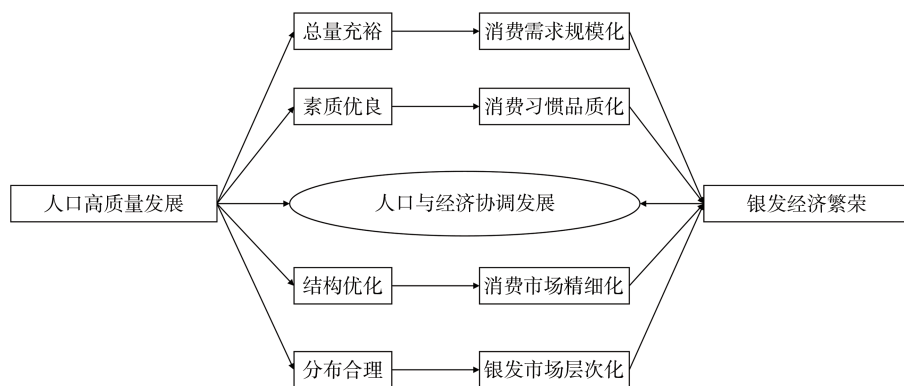


图2 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银发经济繁荣的内在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人口高质量发展与构建银发经济新格局的路径选择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适应深度老龄化的社会需求,必须以制度变革适应人口发展的新形势,重新定义老年人的经济功能与社会价值,以生产性老龄化和激活第二次人口红利为理念先导,回应老龄化时代劳动力供给、家庭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通过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银发经济繁荣,需要建立起一套跨越人口、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制度体系。

(一)以积极老龄观为指引,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积极老龄观强调老年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反对将老年群体简单地看作社会负担或需要照顾的对象。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积极老龄观是促进银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贯彻积极老龄观能够有效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通过提升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劳动市场参与度以及健康水平,推动相关产业的繁荣。只有全社会将老年群体视为社会资源而非负担,才能真正释放银发经济的潜力,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一,开展公共宣传与教育。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学校教育等形式,积极传播关于老龄化的科学知识和积极老龄观。突出老年人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的积极贡献,消除老年人“无用”或“负担”的刻板印象。通过社交媒体、新闻媒体、电视节目等多种途径,展示老年人在各个领域的积极形象。通过树立“银发网红”等正面典型形象,提升公众对老年群体的积极认知。

第二,推动代际融合与合作,促进代际交流与共融。创建更多促进代际合作的机会,如跨代志愿项目、老年人和年轻人共同参与的社区活动等,增进不同年龄段的交流 and 理解。通过代际互动,打破社会中存在的年龄刻板印象与歧视,增强代际之间的相互尊重与支持。在家庭、社区和社会层面,倡导代际互助理念。年轻人可以通过与老年人互动,学习到经验与知识,老年人也可以从年轻人之中获得技术支持和新的思维方式。通过合作共赢,促进代际间的和谐相处^①。

第三,将积极老龄观纳入学校教育,推广终身学习理念。从学校教育阶段开始,向学生普及老龄化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对老年人的尊重意识。通过设置与老龄相关的课程,组织学生参与老年人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对老龄社会的责任感和理解。鼓励和支持老年人继续学习和培训,帮助他们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

^① 李俏:《中国式养老与代际项目的视域融合——基于百度和谷歌搜索的社会学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二)以创新为驱动,建立适应老年人口规模的银发产业

构建创新驱动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适应庞大老年人口规模、推动银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此过程中,需注重技术创新,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将人口老龄化的数量负担转化为质量提升优势。不仅要通过创新来重塑传统产业,也要壮大智慧养老、远程医疗、智慧健康管理等新兴产业,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为银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第一,重塑传统产业。在老龄社会,几乎所有产业都将因人口老龄化而转型,呈现经济的银发化^①。新兴技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延长老年人的工作寿命和方式,重塑传统产业不仅需要凭借技术赋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让老年人更多地参与到银发经济发展之中;也需通过创新驱动,建立互联互通、共生共赢的现代银发产业生态系统,为银发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比如,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实践的“银发产业园”“老年商圈”等产业集群,不仅可以实现养老、医疗、文娱等领域的有机整合,还更加全面地满足了老年人群体的多元化需求。

第二,壮大新兴产业。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满足了老年人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也为银发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推动数字技术在消费领域的集成应用,也将促进老年人口消费市场的多元化。借助技术手段,企业可以更精准地分析老年人的需求,开发个性化产品和服务。数字技术与银发经济的结合应旨在从根本上理解和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重点关注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易用性、安全性和可及性需求,使老年人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能预防数字技术可能导致的社会疏离。

第三,融合发展产业。一是推动健康管理及医疗技术进步。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因素之一。现代医疗技术和大数据分析为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提供了可能,也为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和生活质量提升提供了保障。通过整合前沿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开发智能化、个性化解决方案,增强了产品和服务的易用性和可及性。二是深化现代金融产业与银发产业之间的融合。随着老年人的财富积累,其对养老金融、保险等金融服务有着更高的需求。发展适应老年人金融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不仅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经济基础,亦为银发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三)以需求分层分类为手段,推动消费市场供给精细化

“银发族”人口结构的多元化给老年消费需求的识别与供给带来了巨大挑战。针对老年人口结构中的多样化需求,采取分层分类的策略能够有效化解这些难题,具体可以通过对老年人群体进行精细化区分,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以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

第一,根据健康状况和消费能力进行人群分类。分类是指根据老年人群体在健康、经济能力和社会参与程度上的差异,将其细分为不同的类型,进而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比如,健康活跃型老年人身体状况良好,经济收入较为稳定,追求高品质生活。对于这类人群,市场可以提供更多健康产品、文化娱乐、旅游和教育等高端服务。又如,慢性病管理型老年人需要定期的健康监控和慢性病管理,养老市场应提供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方案。再如,失能或半失能老年人需要长期护理和医疗服务,市场应聚焦于护理机构、居家护理和康复护理设备的开发与完善。通过分层服务,能够更好地匹配老年人群体的需求和服务供给,避免“一刀切”的服务模式,提升银发经济的整体效益。

第二,根据年龄、城乡、性别和文化差异进行人群分层。分层是指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对老年人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分析和设计。由于城市老年人较易获取医疗和文化资源,市场可以更多地关注他们在精神健康、文化娱乐和社交需求方面的产品和服务,如老年社交平台、文化旅游产品、城市康养社区等。农村地区的老年人面临资源短缺和照护服务不足的问题,政府和市场可以通过政策支持和技术手段,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社区养老模式,以及针对农村老年人生活需求的基础设施改善。此外,女性老年人往往比男性老年人寿命更长,且独居和丧偶的比例更高,她们在晚年生活中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关怀。因此,市场和政策设计应更多关注女性老年人在生活保障、精神健康和社交

^① 吴玉韶、李昊臻:《银发经济发展对养老金融的需求》,《中国金融》2024年第12期。

需求方面的特殊性。

（四）以人口素质提升为核心，激活老年人消费潜力

提升全社会人口素质，尤其是老年人口的素质，也是促进银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人口素质的高低直接体现在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以及对创新和技术的接受程度上。较高的人口素质不仅有助于老年人继续保持对社会的贡献，也有助于激发老年人消费潜力。

第一，加强人才建设，推动老年人终身学习。教育是提升人口素质的根本途径。银发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体系不仅需要医疗护理、智慧科技、养老服务等领域的专门化人才，亦需要培育这些人才的教育人才。可以通过职业培训、网络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多种途径，培养专业技术与人文关怀兼具的产业人才和教育人才。此外，提升老年人口素质同样不可忽视。尽管大多数老年人在退休前已完成基础教育，但终身学习的理念在老龄化社会中尤为重要。政府和社会应推动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为老年人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和平台。可以通过老年大学、在线课程等形式，帮助老年人更新知识，适应新科技和新经济模式。

第二，提高健康素质，推动“健康老龄化”。健康是老年人享受高质量生活的前提。提升老年人口的健康素质，不仅能够减少医疗成本，还可以延长老年人的健康寿命，增加他们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时间。应加强老年健康教育，推广预防为主的健康管理模式，鼓励老年人定期体检、合理膳食、适度锻炼，以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第三，推动文化素质提升，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人口素质的提升不仅仅体现在教育和健康上，还应包括道德文化素质。文化素质的提升意味着老年人在面对新科技和新消费模式时，能够更主动地学习和适应。同时，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带来的获得感直接影响到银发经济的活跃度，通过鼓励老年人继续融入社会，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志愿服务等，可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五）以城乡融合发展为目标，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

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日益突出，导致不同地区在资源配置、服务供给以及社会保障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旨在通过打破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推动资源、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均衡分布，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这一战略对于银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有效应对城乡老年人口在生活、健康、养老等方面的不均衡问题。

第一，推动基础公共服务和养老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农村地区长期以来在养老设施、康养服务等方面投入不足，使得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通过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政府和企业可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医疗、养老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缩小城乡差距。一方面，发展多样化的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如农村互助养老、农村幸福院等，解决农村老年人照护难题；另一方面，通过鼓励医疗资源下沉，促进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升。

第二，缩小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差距。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推动资源从城市向农村地区合理流动，支持农村地区发展老年文化活动中心、老年人社会参与项目，满足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除政府的政策引导外，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也同样重要，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等都可以在银发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企业可以通过投资养老产业、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智能设备，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服务。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则可以通过志愿者服务、心理关怀等方式，帮助农村老年人融入社会，提升生活幸福感。

第三，提升农村地区数字化水平。应通过智慧城市和智慧农村建设，推动老年人更好地融入数字化社会，提升其生活便利性和幸福感。智慧养老是解决城乡养老服务差距的重要途径，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如远程医疗、智能监控设备、健康管理平台等，可以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让他们享受到同等的服务。

第四，促进乡村振兴与银发经济联动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不仅要关注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还应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带动银发经济的增长。通过发展农村休闲农业、康养旅游等新兴产

业,吸引城市老年人到农村地区进行养生、疗养、旅游等活动,既能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也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实现老年人养老需求和乡村振兴的双赢。

五、结语与思考

随着老龄化深入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银发经济已经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构成,成为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产业体系更新完善的重要部分。《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四个方面26项措施,构建了系统性的战略框架。发展银发经济,让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必须建立适应当前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的社会经济制度。以总量充裕、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和分布合理为核心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成为推动银发经济规模化、品质化、精细化和层次化的重要动力。反之,在银发产业链的各环节贯彻老龄友好理念,精准回应老龄群体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可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助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老龄群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直接或间接地持续发挥积极作用、继续实现自我价值,实现人口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必须认识到,银发经济并不仅仅是一种市场行为,也嵌入于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当中。一方面,银发经济的繁荣需要市场的全面与深度参与,唯有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激发市场机制的能动作用,银发经济方能得以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在银发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需构建老年人、市场、政府、社会多个主体的协同共治:银发者是银发经济的需求者和受惠者,没有他们的诉求,就不会有银发经济的发展。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产学乐旅、医护康养等高质量生活与人文关怀的各个环节,市场都是银发经济的创造者、服务者;市场对待银发经济的认识与态度、其所生产的各类产品的适老化程度等,决定了银发经济的发展前景,也决定了老年群体对银发经济的使用度、受惠度,而市场也通过满足银发者的需求而创造经济效益。政府则是银发经济的引领者、协调者,没有政府的引领与协调、前瞻性政策和有效的沟通机制,市场的创新活力可能难以被激发出来,资源配置的高效与公平也难以实现。社会是银发经济的“润滑剂”,社会组织在推动银发经济发展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可以做好老年人、市场和政府之间的链接和补充来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毫无疑问,在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的同时,银发经济正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与新引擎。它不仅可促进不同行业和领域间的技术创新和服务革新,也可助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生活模式的演进,成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且是迈向健康老龄化的关键路径之一。深入挖掘老年群体及其市场的潜力,有助于扩大整体社会的消费规模,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同时,随着银发经济的蓬勃与健康发展,通过完善面向老龄群体的服务系统,能显著提高老龄人口的生活质量,增进社会福祉,促进形成更加包容、更为和谐的社会氛围,对于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且深远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Promoting Silver Economy Prosperity Through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ternal Logic and Path Selection

Yang Juhua¹ Liu Yifeng²

- (1. Research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Ethnic Develop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P.R.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P.R.China)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s a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hinese society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two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First, population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characterized by emerging trends including declining birth rates, population aging, and regional demographic divergence. Seco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ransitioning from an extensive growth model based primarily on labor consumption to a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ity. This new productivity paradigm emphasiz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elligent systems, sustainability, and optimal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Such a shift aims to promote changes in production method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o enhanc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quality. The existing demographic challenges impose substantial pressures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cessitating innovative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i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se urgent issue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has become a crucial strategy for China to address population aging and cultivate new economic growth driv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silver economy prosperity is rooted in both Malthusian and Marxist population theories while embody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productive aging and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which aims to achieve a population characterized by excellent quality, appropriate scale, optimized structure, and rational distribution, represents a breakthrough strategy to enhance the synergy between the current new normal of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social progres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emerging silver economy paradigm through four dimensions: quantity, structure, quality, and distribut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substantial elderly population drives consumption demand scal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promotes consumer product refine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enhances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rational distribution induces silver market strat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deepening population aging, institutional reforms must adapt to new demographic realities by redefining the elderly's economic functions and social values. Guided by productive aging principles and activation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se reforms must address rapid changes in labor supply, family patterns, and social structures. Achieving coupled development between high-quality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silver economy requires establishing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populati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Key implementation paths include promoting positive aging perspectives, strengthening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mplementing effective stratification strategies, enhancing population quality, and foster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o advance silver economy.

Keywords: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ilver economy; Deal with the aging popul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王苏苏]